

# 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与伦理取位

——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探析

■ 尚必武

作为当今北美最有影响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学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和推崇。本文试图从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伦理取位等三个维度,来综合考察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在叙事聚焦这一论题上,费伦挣脱了故事与话语之分的教条式羁绊,在驳斥西蒙·查特曼、杰拉德·普林斯等人关于叙述者无法感知,不能充当聚焦者这一论点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叙述者充当聚焦者的可能性与效果,并分析了由此而产生的双重聚焦现象及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的影响,为叙事聚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关键词]詹姆斯·费伦;修辞性叙事学;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7-0032-09

尚必武(1979—),男,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叙事学研究。(上海 200240)

##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逐渐走出解构主义思潮的阴影,再度崛起,迅速跃居为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针对叙事学的复兴与上升态势<sup>①</sup>,有论者断言:叙事学“已经取代小说理论而成为文学研究所主要关心的一个论题”<sup>②</sup>(P15),叙事学日益“占据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位置”<sup>③</sup>(Pxxviii),而且“极有可能在文学研究领域居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sup>④</sup>(P174)。在《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一书中,申丹教授曾说:“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sup>⑤</sup>(P203)可以说,“流派纷呈、百家争鸣”,是对当下西方叙事理论研究盛况的

最佳概述。姑且不论后经典叙事学如何与经典叙事学二分天下、并行不悖,单就其分支而言,就有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可能世界叙事学、历史文化叙事学、后现代叙事学等诸多派别。作为后经典叙事学众多跨学科派别之一的修辞性叙事学则越来越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若论及修辞性叙事学,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 1951—)是一位非提不可的人物。申丹教授称费伦是“当今北美最有影响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sup>⑥</sup>(P242)、“美国叙事理论界权威”<sup>⑦</sup>(P134);《叙事本质》(*The Nature of Narrative*, 2006)一书的四十周年纪念版,更是将费伦赞誉为“国际知名的叙事理论专家”<sup>⑧</sup>。

作为第三代芝加哥学派(又曰新亚里斯多德学派)兼修辞性叙事理论学派的杰出代表<sup>⑨</sup>,费伦深得多位芝

加哥学派第一代、第二代批评家的“真传”。从罗纳德·萨门·克莱恩 (Ronald Samen Crane) 和谢尔顿·萨克斯 (Sheldon Sacks) 身上,他学会了对形式力量的关注;从拉尔夫·拉德 (Ralph Rader) 身上,他明白了形式批评并不至善至美;从韦恩·布斯 (Wayne C. Booth) 身上,他领悟了修辞与诗学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萌发了对叙事修辞模型的兴趣。此外,他还从布斯身上学会了一种伦理思考的方式。<sup>④</sup>费伦集各导师之长,从修辞维度展开对叙事文本和叙事诗学的研究,在叙事学界独树一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有论者赞叹:“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以其综合性、动态性和开放性构成了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的一个亮点。”<sup>⑤</sup>费伦在修辞性叙事理论领域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论著,其中代表性的有《来自词语的世界:小说语言理论》(Worlds from Wo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Fiction, 1981)、《阅读人物、阅读情节:人物、进程及叙事阐释》(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1989)、《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1996)、《为了生存的叙述:人物叙述的修辞与伦理》(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2005)、《体验小说:判断、进程,以及修辞叙事理论》(Experiencing Fiction: Judgments, Progressions, and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2007)等。

值得欣喜的是,近几年来,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逐渐引起了国内叙事学研究人员的关注,并对其部分著作进行了翻译与评介。遗憾的是,这些翻译与评介基本上都是围绕费伦的人物观、读者观、进程观等展开,同费伦宏大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相比较而言,无疑有着明显的不足<sup>⑥</sup>。本文着力探讨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在阐述费伦的“叙述者可作为聚焦者”这一论点的同时,着力评析由此而产生的“双重聚焦”及其对伦理取位的影响,以求进一步推进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在国内学界传播,为国内叙事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 二、叙述者何以作为聚焦者?

根据《Routledge 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对叙事聚焦的定义:叙事聚焦是指与某个人(通常是某个人物)的感知、想象、知识,或视点相关的叙述信息起源与视角限制。叙事聚焦实际上涵盖了对叙述信息的规范、选择,以及传输等各种方式,尤其是从某个人物的视点来观察事件,不论这一视点是多么的主观化与不可靠。<sup>[6](P173)</sup>叙事聚焦这一术语原为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于1969年率先提出。在《修辞格II》一文中,热奈特在参照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叙事聚焦这一概念,力图澄清叙事学界在“谁说”(who speaks)与“谁看”(who sees)这一问题上长期存有的混乱;继而在《叙述话语》一书中,热氏又对叙事聚焦理论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和阐释。他根据叙述信息受限制程度的高低,提出了叙事聚焦的三种类型:1、无聚焦(non-focalization)或零聚焦(zero-focalization),相当于让·普荣的后视野(vision within),或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聚焦类型中,事件被没有限制的全知叙述视角所叙述。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以及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2、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相当于普荣的内视野(vision from behind),珀西·卢伯克的“视点”叙述,乔治·布兰的“有限视野”,或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聚焦类型中,事件是通过聚焦人物的视点、感知、认知被呈现出来。如罗伯—格里耶的《嫉妒》,福克纳的《焚烧粮仓》等。3、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相当于普荣的外视野(vision from outside),或托多洛夫的叙述者<人物的视角公式。在这一聚焦类型中,事件的叙述只局限于从外部视点,以及行为报告(behaviorist report)等角度出发,基本上只陈述摄像机所能拍到的东西,如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杀人者》<sup>[7](P189-198)</sup>。

在费伦看来,尽管热奈特创造叙事聚焦这一术语的初衷,在于力图澄清叙事学界在“谁说”与“谁看”(后来修正为“谁感知”)这一问题上长期存有的混乱,但遗憾的是,热奈特的这一“洞见”在澄清混乱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混乱。热奈特对叙事聚焦三种类型的划分不是以“谁看”与“谁说”为标准。相反,他是以人物关系为参照范式,来判断叙述者看到或知道信息的多少。也就是说,

虽然热奈特区分了“谁说”与“谁看”，但他又混淆了“谁说”与“看到什么（或看到多少）”（what [or how much] is seen）这两个概念，这样无疑又给叙事聚焦研究增添了新的混乱。费伦认为，倘若热奈特能以说话者与感知者之间的关系为参照范式，或许能对叙事聚焦类型做出更为理想的划分。<sup>[8](P111)</sup>

撇开热奈特的理论盲点不说，费伦主要把另外两位叙事学家塞姆尔·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和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视作自己商榷的对象。查特曼与普林斯的共同观点是：叙述者不能充当聚焦者，充当聚焦者的只能是人物，人物和叙述者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他们认为，叙述者可以充当聚焦者的观点违背了经典叙事学“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逻辑。根据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逻辑，人物只能存在于故事之中，而叙述者只能存在于话语之中，两者断然没有重合的可能。具体而言，人物能够感知、思考、行动，而叙述者充其量只能报道。

查特曼于1986年在《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杂志上发表了《人物与叙述者：过滤器、中心、看法、兴趣焦点》（*Characters and Narrators: Filter, Centre, Slant, and Interest - Focus*）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查特曼对热奈特的叙事聚焦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叙事聚焦这一术语的缺陷在于它不能解释人物和叙述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他主张用“过滤器”和“看法”两个术语来替换热奈特的“叙事聚焦”。在查特曼看来，叙述者仅仅报道事件，但在报道事件的那一刻不一定就会看到事件的发生。他建议用“看法”来表示叙述者的态度以及适合于话语报道功能的其它心理方式，而用过滤器来表示“折射人物”的心理过程，其中包括感知、认知、态度、记忆、幻想等。查特曼还认为，如果我们要保存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区别，我们就不能用一个术语来涵盖叙述者和人物的各自行为。<sup>[9]</sup>

(P189 - 204)

4年后，在《叙事术语评论：小说与电影叙事的修辞》（*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1990）一书中，查特曼更是强调了叙述者不能感知的论点。他还以狄更斯的小说《董贝父子》的第一段为例，说明叙述者如何只能作为故事的报道者而不是观

察者。下面，让我们首先来看《董贝父子》的第一段：

在一间被光线遮暗了的房间的角落里，董贝坐在床边一张大扶手椅子上；他的儿子被包裹得暖和和的，躺在一个小摇篮里；这个小摇篮被考虑周到地放在紧靠着壁炉前面的一条矮矮的长靠椅上，仿佛他的体质和松饼相似，需要趁着他很新鲜的时候，把他烤成棕色。<sup>[10](P1)</sup>

对于这段话，查特曼评价道：“在这里，我们不应该相当地认为，叙述者直接思考刚出生的婴儿，然后在思考中认为婴儿就像一块松饼……这里的叙述者是没有身份的全知叙述者，他只是一个‘报道者’而不是可以直接见证故事世界的‘观察者’。如果仅根据叙述者的叙述就认为故事完全由叙述者来感知，是不正确的观点，因为叙述者的叙述只是呈现或者再现，而不是感知。”<sup>[11](P141 - 142)</sup>对查特曼而言，无论是异质叙述者还是同质叙述者都不能感知故事世界。因为异质叙述者不在故事世界之内，所以他永远不可能看到故事世界的事件；虽然同质叙述者或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故事发展的早期看到了事件或对象，但他在此之后的叙述只是一种回忆，而不是感知。在查特曼看来，故事与话语是两个不同的本体世界，叙述者断然没有从一个世界跨进另一个世界的可能。也就是说，聚焦者在故事世界的存在是其得以感知的必要条件。

费伦对查特曼关于叙述者不存在于故事世界，因此不能感知、不能充当聚焦者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在费伦看来，查特曼关于“聚焦者在故事世界的存在是其得以感知的必要条件”，只是一个可能的假设。单就《董贝父子》的第一段而言，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叙述者将婴儿比喻为松饼，既揭示了报道与感知的共时性，也反映了叙述者对故事世界的感知；更为重要的是，叙述者的报道或感知行为也给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提供了感知。费伦认为，《董贝父子》的第一段表明“查特曼对叙述者的限制使叙事（尤其是虚构叙事）失去了奇迹，就叙事规约而言，叙述者不需要存在于故事世界就能感知，并充当我们得以观察故事世界的一双眼睛”<sup>[12](P58)</sup>。

普林斯虽然抛弃了查特曼的“过滤器”这一术语，保留了叙事聚焦，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术语大致等同于查

特曼的“过滤器”；而且，与查特曼相仿，普林斯坚信故事与话语之分对判断叙事聚焦的作用。在普林斯看来，叙事信息的传递一般需要两种途径：一是叙述者报道故事世界实体的感知，二是叙述者不报道故事世界实体的感知。前者有聚焦存在，而后者则没有聚焦。但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后，普林斯接着又承认，“同质叙述者的同时叙述或滞后叙述，以及异质叙述者的真实时间的叙述，有可能会提供一些与此相反的特例。例如，《马洛之死》中有这样片段：‘因为这是夜晚，甚至是深夜，是我所能记得的最漆黑的夜晚，我的记性不是很好。在铅笔还未在划过纸的边缘，并给出已近结局的警告之前，我的拇指滑动了。’”<sup>[13] (P46)</sup>遗憾的是，普林斯非但没有详细分析这些特例，而且还忽略了它们，极力维护故事与话语这一判断叙事聚焦的标准。

在《视角的视角或聚焦的重新聚焦》(A Point of View on Point of View or Refocusing Focalization, 2001)一文中，普林斯详细解释了叙述者不能充当聚焦者的原因。他说：“如果叙述者永远不能成为聚焦者，有可能是因为无论叙述者所处的话语位置和叙述位置如何，他永远都不是其叙述话语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因为叙述者是话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故事的一个因素，而聚焦是属于故事的。”<sup>[13] (P46)</sup>随后，普林斯直接参照查特曼的论述，进一步得出结论：“就言语叙述而言，叙述者只是再现的工具而不是聚焦的工具。”<sup>[13] (P46-47)</sup>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查特曼与普林斯将“感知”与“报道”分了家，他们认为报道属于话语层面，而感知属于故事层面。查、普二人的缺陷不仅在于没有阐明叙述者在叙事聚焦中的功能，而且还在于没有解释叙述者对被叙述对象、隐含读者、真实读者的感知。费伦虽然承认，在叙事理论中，查、普二人的划分标准具有清晰方便的优点，但实际上，感知与报道，或者感知与回忆（就同质叙述者而言）的区分是很难实现的，除非我们将所有的叙述者都视作报道机器。道理很简单，一个叙述者在报道连贯的事件序列的同时，不可能不暴露出他对这些事件的感知。单是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就能说明这一问题，从故事这一层面而言，一个连贯的事件序列能够被一种以上的方式报道出来；而从话语这一层面而言，任

何叙述都只是通往故事世界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带有叙述者视角标记的途径不仅是对故事世界的报道，同时也是叙述者对这个故事世界的感知。就像人物在行动时不可能不会显示出自己的性格特征一样，叙述者在报道时不可能不显示出自己的感知。

实际上，当查特曼与普林斯二人将人物在故事层面上的行动并置于叙述者在话语层面上的叙述时，这一做法本身也暗示出报道与感知的不可区分性。查特曼本人在解释“过滤器”与“看法”这对概念时，曾经委婉地暗示将叙述者与人物的感知加以并置是不确切的。他说：“我建议用‘看法’来指叙述者的态度以及其它符合话语报道功能的心理差异，而用‘过滤器’来指人物在故事世界里经历的更大范围的心理活动——感知、认知、态度、情感、记忆、幻想等。”<sup>[11] (P143)</sup>但是，我们很难在人物的感知与叙述者的感知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例如，《项狄传》中的项狄、《远大前程》中的皮普、《洛丽塔》中的亨伯特等这些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同样被叙述者展示出来。

在对普林斯与查特曼的叙事聚焦观进行一番综合的考察与批判之后，费伦得出结论：“简言之，叙述者可以作为聚焦者。确定叙事聚焦的问题实质就是回答‘谁感知’的问题。这无论对异质叙述、同质叙述，还是对第二人称叙述都同样适用。”<sup>[12] (P58)</sup>费伦力图对查特曼与普林斯判断叙事聚焦的标准（故事层面的感知与话语层面的报道）加以修正，他认为：叙事聚焦并不是人物的视野、知识同叙述者的视野、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纯粹属于“谁感知”的问题。<sup>[12] (P63)</sup>

费伦认为，叙述者可以充当聚焦者这一论点对叙事研究与叙事分析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影响或启示：1、使我们意识到故事与话语之区分只是“探索性的建构”，而不是“自然法则”；是我们发明出来帮助我们对叙事的理解，而不是在叙事评价与人物行动之间树立起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2、对我们研究“同质叙事”或“自我叙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通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即叙述者的自我意识性）提供了新的途径。3、使我们对视野与声音之间的可能关系的认识加以修正，进而提出新的类型。<sup>[12] (P51-52)</sup>此外，费伦还建议我们对热奈特的叙事聚焦模式加以修正，提出如下的五种结合情况：(1)叙述者的

聚焦与声音。(2)人物聚焦与叙述者的声音。(3)人物的聚焦与声音。(4)叙述者的聚焦、声音同人物的聚焦、声音的混合。(5)叙述者的聚焦与人物的声音。<sup>[8](P117)</sup>

在笔者看来,就叙述者充当聚焦者的效果而言,费伦的论述有一个盲点:他没有意识到,当叙述者充当聚焦者时,可以导致故事与话语的重合,使故事沦为话语的一部分,这在后现代主义元小说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元小说中,“侵犯式叙述者”在叙述故事的同时,又对叙述过程加以评价,透露自己在创作中个所思所悟(感知),彰显其“自我反映性”本质。例如,《项狄传》的第四卷第十三章有这样的一段叙述:

在我讨论了我与读者之间的奇特事态之前,我是不会写完那句话的……我上个月比12月前又长了一岁,而且,如您所见,已差不多写完第四卷的一半了,但刚刚写完我出生后的第一天……<sup>[14](P255)</sup>

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叙述过程:1、叙述者项狄叙述这段话的过程;2、项狄叙述他写作这本书过程。有论者认为,“第一个过程读者根本看不到(仅能看到叙述出来的话);第二个过程则被清楚地摆到了读者面前。我们认为第一个过程才是真正的叙述过程;第二个过程实际上是故事内容的一部分。”<sup>[15](P19)</sup>换句话说,第二个叙述过程作为第一个叙述过程的一部分,是一种嵌入叙述。但就在第一个叙述过程中,叙述者项狄透露出感知:“我是不会写完那句话的”,即叙述者充当聚焦者。在项狄感知话语中蕴涵着所叙述的故事,进而变相地使故事与话语得以重合。

人物可以充当聚焦者这是所有叙事学家都赞成的观点。但当叙述者一旦也充当聚焦者之后,势必有可能在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双重聚焦(叙述者的聚焦、人物的聚焦)的情形。对此,费伦以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为例,详细论述了双重聚焦及其对伦理取位的影响。

### 三、双重聚焦及其对伦理取位的影响

在论述叙述者可以充当聚焦者时,费伦首先以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第二部分第三章的结尾为例:

我们驶到了东部。我的感情需求更多得到的似

乎破坏而不是稳定,她则闪烁着健康的光泽,颈上一对回肠花圈似的装饰品仍像小伙子一样简单,尽管她身高又增加了两英寸,体重又增加了八磅。我们到过每个地方,实际却一无所览。今天我总认为我们漫长的旅行不过是有一条迂回蜿蜒的粘土路亵渎这个迷人、诚信、梦幻般广阔的国度,回想起来,它对于我们,不过就是破旧地图、毁坏了的旅游书、旧轮胎以及她夜里的哭泣的一份收集——每夜、每夜——在我假装睡着了的时候。<sup>[16](P176)</sup>

在详细阐释叙述者作为聚焦者这一论点之前,费伦先是列举了其他叙事学家对这段叙述可能做出的聚焦分析。在热奈特及其追随者们看来,这段叙述蕴涵着聚焦的变化:一开始是内聚焦(视点属于人物亨伯特),后来又转向了零聚焦或无聚焦(视点属于叙述者亨伯特),最后聚焦又回到视点属于人物亨伯特的内聚焦。米克·巴尔及其追随者们则重在强调这段叙述所包含的聚焦者(叙述自我、经验自我)与被聚焦对象,认为被聚焦对象先是从亨伯特转移到洛丽塔,再到“迷人、诚信、梦幻般广阔的国度”,最后又回到洛丽塔,被聚焦对象的转移与聚焦者的转移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里蒙-凯南与苏珊·兰瑟等人则有可能强调聚焦的变化不仅仅存在于视点,还存在于情感、心理、意识形态等层面:人物亨伯特先是聚焦于他自己的生理激情与时间在洛丽塔身上的流逝;而叙述者亨伯特则聚焦于人物亨伯特的激情对洛丽塔的心理产生的不良影响。帕特里克·奥尼尔则可能认为隐含作者纳博科夫是本段叙述的终极聚焦者。查特曼将会抛弃聚焦这一术语,认为这段叙述由人物亨伯特这一过滤器转移到叙述者亨伯特这一斜面,最后又回到人物亨伯特这一过滤器。普林斯则可能会说,这段叙述的第一部分是由人物亨伯特作为聚焦者,其后则没有聚焦,直到最后再由人物亨伯特来实现聚焦。<sup>[12](P53)</sup>

如前所述,费伦意在强调叙述者可以作为聚焦者。从“今天我总认为”(I catch myself thinking today)这句话可以得知,这段叙述的前半部分是由叙述者亨伯特所聚焦的。但是从“回想起来,它对于我们,不过就是破旧地图、毁坏了的旅游书、旧轮胎以及她夜里的哭泣的一份收集——每夜、每夜——在我假装睡着了的时候”(by

then, in retrospect, [the country] was no more than a collection of dog-eared maps, ruined tour books, old tires, and her sobs in the night—every night, every night—the moment I feigned sleep) 这句话又可知,这段叙述的后半部分是由人物亨伯特所聚焦。必须指出的是,当人物聚焦开始时,叙述者聚焦并没有消失。与之相反,叙述者聚焦包含了人物聚焦。<sup>[12] (P60)</sup> 费伦叙述者聚焦包含人物聚焦的现象从句法上也可以判断出来,“今天我总认为”(I catch myself thinking today) 实际上包含了后面所这段叙述所说的一切内容,而且“回想起来”(in retrospect) 这一短语的模糊性更是加强了这一效果。“回想起来”既可以指从叙述者当前出发的回想,也可以指人物的回想。

当叙述者亨伯特的聚焦包含着人物亨伯特的聚焦的时候,亨伯特的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都看到了洛丽塔的“每夜、每夜”的哭泣。受到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双声(double voice)概念的启发,费伦将这种聚焦现象称为双重聚焦(dual focalization)。另外,此时的双重聚焦使得该段叙述的故事与话语出现了重合:叙述者亨伯特既看到了哭泣的洛丽塔,也看到了他过去的自己(通过他过去自己的眼光)。

不过,论及费伦的双重聚焦,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三点:1、费伦的双重聚焦与韦恩·布思的双重焦点(dual focus)是有本质的区别。在《小说修辞学》中,当布思在论述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说谎者》时,曾提及不可靠叙述者与主要人物对注意中心(centers of consciousness)的争夺,他称此为双重焦点。可见,布思的双重焦点不涉及感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聚焦,而费伦的双重聚焦是涉及感知,是纯粹意义上的聚焦。2、费伦的双重聚焦也不同于热奈特的双聚焦(double focalization)。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以及后来的《再论叙事话语》两本论著中,曾用双聚焦这一术语来指称《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马歇尔的聚焦与小说中另一位人物聚焦共存现象。但是,费伦的双重聚焦则是指称叙述者的感知与人物感知的同时性(simultaneity)。可见,费伦的双重聚焦与热奈特的双聚焦也有着本质的不同。3、如果非要在费伦的双重聚焦与其他叙事学家的聚焦观之间找出相似之处的话,米克·巴尔的聚焦层次(levels of focalization)可能是一个有益

的参照。巴尔的聚焦层次表示一个聚焦中又被嵌入进另一个聚焦的意思,这与费伦用双重聚焦表示叙述者聚焦包含人物聚焦的用法似乎有几分相似。但二者绝对不雷同,巴尔的聚焦层次都是人物聚焦;而费伦的双重聚焦既有人物聚焦也有叙述者聚焦。只是在嵌入聚焦(embedded focalizations)这一意义上,它们的含义是相近的。

双重聚焦的效果除了以上论及的叙述者作为聚焦者的效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伦理取位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伦理取位(ethical position)是修辞叙事学尤为关注的一个理论维度。费伦更是在多处论述了他的伦理取位观。<sup>⑥</sup>针对阅读伦理,费伦提出,伦理取位既指叙事技巧和结构决定读者对于叙事的位置的方式,也指个体读者不可避免地从事特定位置进行阅读的方式。文本通过向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发送信号,收到预期的具体伦理回应,而个体的伦理回应则依赖于那些预期目标与我们自己的特定价值以及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费伦还认为,“取位”(position)是阅读伦理研究法的一个中心建构,这一概念把“行为缘由”和“所处位置”一并放在伦理视角之下。具体说来,

叙事里所处的任何一个伦理位置都是四种伦理情境互动的结果:(1)故事世界中人物的伦理情境;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对他人的评价无一不与伦理相关;(2)与讲述行为、被讲述对象、读者相联系的叙述者的伦理情境;譬如,各种不同的不可靠性会再现各种不同的伦理位置;不同的聚焦也会是叙述者处于不同的伦理位置;(3)与讲述行为、被讲述对象、作者的读者相联系的隐含作者的伦理情境;隐含作者选择这个叙事策略而不是那个叙事策略将会影响读者对人物所做出的伦理反应;每个选择也都反映了作者对读者所持有的态度;(4)真实读者的伦理情境,这与在前三个情境中起作用的一系列的价值、信仰、位置都悉数相关。<sup>[8] (P23)</sup>

费伦从读者、文本(其中包括隐含作者、作者的读者)作者等维度来定义伦理取位,强调了伦理取位的四种伦理情境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旨在彰显叙事进程的动态性。可以说,他的伦理取位理论新颖独特,是其

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亮点之一。就双重聚焦而言,费伦认为上述的四种伦理情境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双重聚焦的影响。

在费伦看来,双重聚焦首先使得“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以及叙述者与被叙述对象、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sup>[8](P120)</sup>,即双重聚焦对前两种伦理情境的影响。例如,在《洛丽塔》之中,“叙述自我”亨伯特通过讲述他的行为、他的感知或再感知“经验自我”与感知或再感知洛丽塔的努力,改变了自己与故事、自己与自己(“经验自我”亨伯特)、自己与洛丽塔、自己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双重聚焦,我们可以发现,“叙述自我”亨伯特既感知到了洛丽塔的痛苦与不幸,也意识到了由于“经验自我”的罪恶导致了洛丽塔的夜晚哭泣。就此,“叙述自我”亨伯特拉开了与“经验自我”亨伯特的距离,同时“叙述自我”亨伯特也显示出自我意识性的特点:他对过去与现在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叙述自我”带有一定的悔悟性。就这样,亨伯特从对洛丽塔哭泣的无视开始转向自责与悔悟,使人物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由冷漠无情到悔悟与同情。并且,双重聚焦也改变了读者与叙述者、读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叙述自我”亨伯特的叙述与悔悟使得读者感受他的真诚,同时也使得读者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经验自我”亨伯特的罪恶。

此外,费伦还以小说《洛丽塔》为例,阐释了双重聚焦对隐含作者的伦理情境的影响。费伦认为,纳博科夫通过选择双重聚焦这一叙事技巧意在让读者注意到自传行为如何影响叙述者亨伯特的叙述。具体而言,纳博科夫通过运用双重聚焦为整个叙事增添了一层厚重的伦理色彩:叙述者亨伯特的伦理斗争。这种伦理斗争可以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在宏观层面上看来,亨伯特是处在是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推卸罪责,还是承认自己的罪责、接受惩罚,这两种伦理立场间的思想斗争;在微观层面上,也即是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所言的“直面”(facing)这一意义上,亨伯特在究竟因为自己对洛丽塔所犯下的恶性,不敢面对洛丽塔,还是愿意接受惩罚,勇敢地面对洛丽塔,这两种伦理立场之间做思想斗争。

就双重聚焦对真实作者的伦理情境的影响而言,费

伦主要阐述了他自己阅读《洛丽塔》的感受。费伦认为双重聚焦既有很大的优点,也不乏有一定程度的缺陷。拿《洛丽塔》来说,一方面,纳博科夫通过双重聚焦让我们对一个恋童癖者产生同情。据此看来,该部小说的伦理在于实现了艺术的最佳功能之一,甚至是以我们厌恶作者的方式,来扩展主要读者(dominant audience)的感觉与感知。但是在另一方面,费伦注意到纳博科夫让读者关注亨伯特的叙述与行动是以牺牲洛丽塔的叙述与行动为代价的。也就是说,纳博科夫使亨伯特在行动层上始终处于控制洛丽塔的地位。另外,费伦认为《洛丽塔》一书,甚或是作者纳博科夫的伦理阴暗面在于他没有对亨伯特的不道德加以反对或嘲讽。相反,纳博科夫对亨伯特的不道德还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喜欢”。<sup>[8](P130-131)</sup>

如前所述,在伦理取位的理论建构上,费伦特别强调四种伦理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遗憾的是,在论述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所产生的影响时,费伦似乎将四种情境关系分了家,采用平行法的方式来对它们加以论述,没有阐明四种伦理情境之间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就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这四种伦理情境之间既互为因果关系,又互为时序关系。一方面,叙述者的伦理情境的变化导致了人物伦理情境的变化,而叙述者伦理情境的变化与人物伦理情境的变化又引起了读者(作者的读者)伦理情景的变化,而读者会因为自己伦理情境的变化,去有意识地推断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伦理情境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按照修辞叙事学家的观点,发生在叙述者的伦理情境、人物的伦理情境、读者(作者的读者)的伦理情境的变化,都是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有意安排。

笔者以为,在《洛丽塔》中,当叙述者亨伯特作为聚焦者时,他的伦理情境发生了变化,他产生了伦理斗争;叙述者亨伯特的伦理情境的变化使人物的伦理情境也产生了变化,人物亨伯特从对洛丽塔哭泣的无视开始转向自责与悔悟,进而使人物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叙述者亨伯特与人物亨伯特的伦理情境的变化又使得读者(作者的读者)的伦理情境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读者因为亨伯特的悔悟与真诚而开始同情他,而且还会推断出作者(隐含作者)纳博科夫的伦理情境的变化,这三

种伦理情境的变化都又可能是作者纳博科夫的刻意安排,也就是说,由于纳博科夫的有意通过双重聚焦使叙述者亨伯特的伦理情境、人物亨伯特的伦理情境、读者(作者的读者)的伦理情境发生了变化。

#### 四、结语

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所关注和强调的是读者(作者的读者)文本、故事、叙述者、作者(隐含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力图建构静态的“普遍叙事语法”(universal narrative grammar)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单从费伦给叙事所下的定义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在《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一书中,费伦将叙事定义为“出于一个特定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读者讲述的一个特定的故事”<sup>[17](P4)</sup>。

正是对各个叙事成分之间互动关系的强调与关注,使得费伦在审视叙事聚焦时,挣脱了故事与话语之分的教条式羁绊。他在挑战查特曼、普林斯等人关于“叙述者不能作为聚焦者”这一观点的同时,详细论述了叙述者可以作为聚焦者的原因与效果,并分析了由此产生了双重聚焦现象。出于对叙事伦理的关注,他还论述了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费伦将叙述者与叙事聚焦、伦理取位联系在一起综合考察,使其理论建构呈现出很强的动态性,为我们研究叙事聚焦打开了新的视角。但是,费伦在论述“叙述者作为聚焦者”的效果时也不乏有一定的盲点:他没有注意到由此产生的故事与话语的重合。另外,费伦关于伦理取位与双重聚焦的论述,在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脱节。这也是国内学者在引介或运用费伦的叙事聚焦理论时,需要注意的。

#### 注释:

①关于叙事学复兴的论述,参见 David Herman, “Introduction: Narratologies”, in David Herman (eds.),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0; 申丹:《美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小规模复兴》,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144-148页。

② R. Scholes, R. Kellogg & J. Phelan,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ee the back cover.

③另一代表人物是费伦的好友彼得·拉宾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有关费伦作为芝加哥学派第三代杰出代表的论述,可参见 James Phelan, “Rhetorical Approaches to Narrative”, in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Oxford: Routledge, 2005, p. 503; David H. Richter, “The Chicago School”, in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Oxford: Routledge, 2005, p. 58; Faiza W. Shereen, “Form, Rhetor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Patricia Waugh (ed.),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n Oxford Gu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33。

④费伦在2006年12月8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曾提到第一代、第二代芝加哥学派批评家对其产生的影响,原文如下:From Crane and especially from Sacks, who was my dissertation advisor, I learned about the power of form? From Booth I learned ab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etics and rhetoric and as a result shifted to a primarily rhetorical model of narrative. I also learned a way to think about ethics, though my way is ultimately different, just as my concept of progression is different from Crane's concept of plot. I'm attaching an essay I wrote about Sacks after his death which is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of his influence on me. Rader taught me that forms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and that they interact with history and culture more than Sacks and Crane acknowledged.

⑤有关费伦著作的翻译,参见詹姆斯·费伦著:《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有关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的评介,参见申丹:《多维互动进程——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载《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第3-11页;申丹等:《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256页;王杰红:《作者、读者与文本动力学——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的方法论诠释》,载《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第19-23页。

⑥关于费伦对伦理取位观的论述,可参见 James Phelan, “The Lessons of ‘Weymouth’: Homodiegesis, Unre-

liability, Ethic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Day", in David Herman (eds.),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8 – 109; James Phelan,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 R. Scholes, R. Kellogg & J. Phelan,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23.

### [参考文献]

[1] Martin, Wallace.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Phelan, James. *Introduction: Diversity and Dialogue in Narrative Theory* in James Phelan (ed.), *Reading Narrative: Form, Ethics, Ideolog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Richardson, Brian. *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 *Style*, 34. 2(2000).

[4] 申丹等.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 申丹. 何为“不可靠叙述”?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 (4).

[6] Jahn, Manfred. *Focalization*. in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7] Genette, Ge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ns. Jane E. Lew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8] Phelan,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9] Chatman, Seymour. *Characters and Narrators: Filter, Centre, Slant, and Interest – Focus*, *Poetics Today*, 7. 2 (1986).

[10] 狄更斯. 董贝父子 [M]. 吴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4.

[11] Chatman, Seymour. *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Phelan, James. *Why Narrators Can Be Focalizers — and Why It Matters?*, in Willie van Peer and Seymour Chatma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Perspecti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13] Prince, Gerald. *A Point of View on Point of View or Refocusing Focalization*, in Willie van Peer and Seymour Chatma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Perspecti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14] Sterne, Lawrence. *Tristram Shandy and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28.

[15]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第三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6]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 洛丽塔 [M]. 于晓丹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7] Phelan, James.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责任编辑: 龙迪勇】